

吴琦幸 著



王元化晚年谈话录

风雪傲青峰千里
荒凉万壑山墨履有威
苦攻野老聊可表出正
国豪情新作醉阳梦
歲月漸摧鬢髮斑心事
蒼生誰堪訴問名更

013965538



K825.6
1002



吴琦幸
著

K825.6
1002

王元心晚年谈话录



北航

C1674096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元化晚年谈话录/吴琦幸著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208-11548-4

I. ①王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王元化(1920~2008)—人物研究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66416号

责任编辑 曹 杨 薛 羽

封面设计 张志全

王元化晚年谈话录

吴琦幸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25 插页 4 字数 83,000

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1548-4/I·1165

定价 28.00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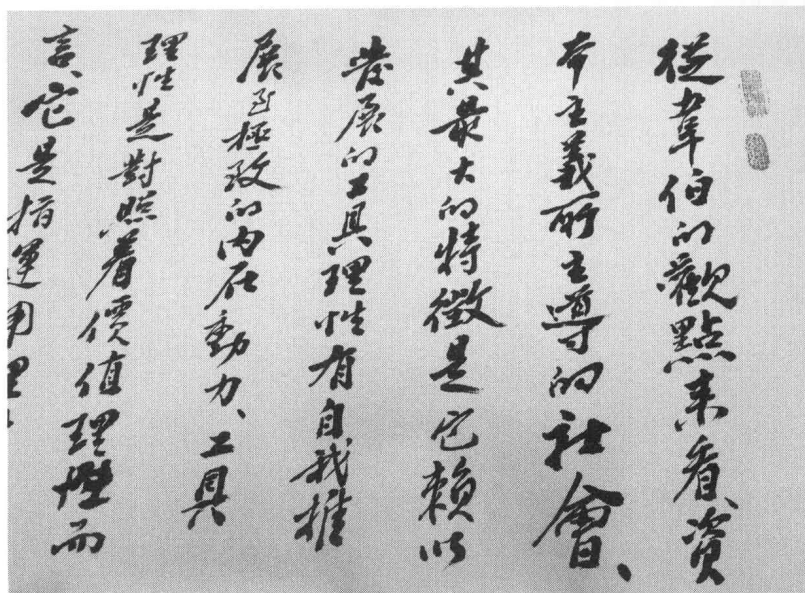
1988年，王元化与夫人张可在广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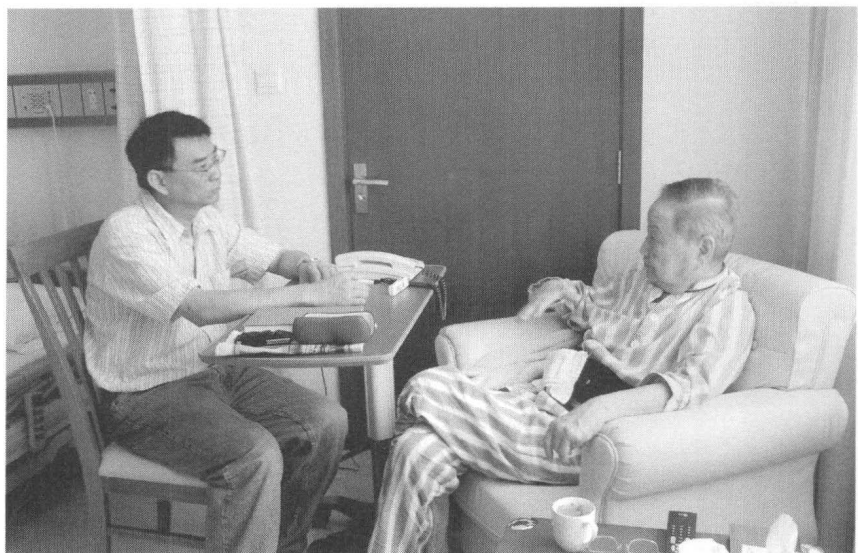
1999年，王元化与五位博士生合影
(后排左起：胡晓明、蒋述卓、陆晓光、吴琦幸、傅杰)



2002年，王元化与林毓生夫妇漫步



王元化书赠林毓生手卷片段



2007年，王元化与吴琦幸在病房对谈

序*

林毓生

元化先生的逝世,我的内心感到极为悲痛。十七年前我们初次见面,发现彼此性格,十分类似;因此,一见如故,很快成为挚友。

他待我至厚,邀我到上海时,务必和他见面。我和我的夫人祖锦,每次有机会来上海,一定去看望他,并曾两度同游杭州,这是我们最为温馨的记忆。今年年初,

* 此为“王元化、林毓生 2008 年 1 月 18 日谈话录”前言,作者授权作为本书序。林毓生,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,中研院院士,王元化晚年的挚友。在本书中王元化多次谈到林毓生教授跟他的学术友谊,并且要让笔者在他身后有问题找林毓生先生请教。这篇谈话录得到了林先生的热情指导和鼓励,谨此致谢。

我到香港讲学，行装甫卸，即来上海瑞金医院，看望在病中的元化先生。当时，一位热心的朋友教他的助理放一个小小的录音机在元化先生的床头，我们和往常一样自由地交谈，并不觉得任何拘束。后来，根据录音记录，我们分别对于自己的谈话内容做了文字上的润饰，表达的思想并无更动。本来我和祖锦已经安排行程，预定在6月12日再来上海看望他。没想到那次会面却成了我们最后的聚谈，留下来的那份记录，弥足珍惜。

元化先生一生努力与奋斗的意义，正如他的最后谈话记录所显示的那样，是根据理性所蕴涵的自由与责任来探讨中国的新生所应走的道路。这也是上海地下党文委其他成员，孙冶方、顾准，所指出的道路。中国现代史的狂潮，恰恰与这样的主张相驳逆，这是中国现代史的坎坷与他们生命中的坎坷的主因。

面对未来，我们的责任则是，在先贤所指出的道路上，继续奋斗下去！

前 言

在王元化人生的后二十二年中，作为他的一名学生，我深切地感到，他首先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模范老师，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和启发，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师生之间学业上的收获。无论是从人格、道德、社会关怀、正义感，还是他深刻的反思精神及其内容，王元化先生都无不成为影响我人生道路、治学和为人的支援力量，这种力量，也鼓舞着我在他去世之后，比他在世的时候花更多时间关注、研究他的学术和思想。

1986年11月，我成为王元化的博士研究生。我的

指导教师原为华东师大古籍所徐震堉先生^①。9月入学,徐先生却于10月11日去世,于是我就向王元化先生提出了转到他名下攻读博士的想法。出于对徐震堉先生学术才情的钦敬,也是对传统朴学训诂、考据的充分理解和尊重,经过面试,王先生收我作为他的第二届博士生。11月13日我正式到王元化家上课。我的日记写着当时的情景:“此时的王元化,刚刚卸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一年多而已,丝毫看不出官样,一派传统学者的儒雅风度,眼睛中含着一种睿智的光芒,盯着你看的时候有一种执着,似乎要看到你的心里。他让我在旁边单人沙发坐下,然后看着我,脸上充满着一种别样的和藹,右手在沙发靠椅上,不停地用手指弯曲重叠,似乎有书写毛笔字的意思。他很随意地问我读了些什么书。我说自己在汉语大词典工作了四年,古籍所读了三年硕

① 徐震堉(1901—1986),早年执教于浙江大学。建国后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。1982年任该校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、博士生导师。

士,对文化与文字有爱好,曾经在罗君惕家中从头到尾学过《说文解字》。他频频点头。王元化先生是一位很好动的人,他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,无论是神情还是坐姿,虽然都进入听的角色,但有时插话,这是他关注他人谈话的最好方式。在我讲到古文字、训诂、词典的时候,他不断地强调,训诂考证非常重要,小学是中国古代的一门基础学科。你有这样的基础,是非常有用的,任何学问都离不开小学训诂。然后问了一下我的硕士论文,读了哪些书。讲到版本目录,他并不陌生,随口说了一些关于《文心雕龙》方面的版本和石刻的情况。跟他相处不一会儿,就会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真诚和儒雅之气。一段话突然在我的脑海中腾起,那是《歌德谈话录》中艾克曼第一次见歌德时候的印象:“他坚毅有力的褐色面孔满是皱纹,每一条皱纹都富有表现力。他的整个神情是如此诚挚而又坚定,宁静而又伟大!他说话缓慢、安详。谈吐如同我们想象中年事已高的王者。看外

表便知道他气定神闲，已然超乎于世间的毁誉之上。”

(1986年11月13日日记)

他的讲课是开放式的，在吴兴路住宅的客厅或者书房里，那个集聚学生们求学求知的欲望而生气洋溢的小小环境中，我度过了三十个月。谈《文心雕龙》，谈文化史研究，谈五四运动，谈样板戏，谈《新启蒙》，他总是围绕着最新的政治、文化、理论问题坦率地谈他的看法，常常切中要害。他自己说，我在写文章之前，先要在脑子中反复思考，我跟你谈，也是思考的一个过程，你也会给我很多的启发。当时正是80年代中后期，理论界有着前所未有的激情，年轻人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西方的哲学、思想新成果，各种思潮兼容并蓄，异常的多元。海外思潮不断涌进，冲击着禁锢将近三十年的中国学界和思想界。先生讲的题目往往超越我的话题，都是他最近的所思所虑所写的文章，也是在当时学术界思想界都在探讨的题目。谈得兴起，他就站起来，在客厅中踱着步，

高昂着头，慢慢述说着，那种神情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后来在90年代的反思中，先生却对80年代的这段思考和研究做了否定，他说那段时间心浮气躁，没有什么东西可留下来。但是我觉得他当时关于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、关于样板戏的问题、关于顾准、关于人文精神的下降、文化的滑坡等，阐述非常重要，直接下启晚年对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冲击的思考。即便他在90年代重新思考五四的问题，改变了80年代的观点，但很多想法也不可偏废。我认为，如果没有80年代的所思所历，就不会有90年代的王元化反思。

那个时候，我每星期三骑车到他家中上课，虽然最初有点拘谨，但是王先生和张可老师^①的亲近平易，像长辈一样地关心着我，渐渐地去他家就没有限制了。想到什么事情了就会去那里，有饭吃饭，不打招呼。最

^① 张可(1919—2006)，戏剧理论家、翻译家，王元化的夫人。

近我查当年的日记,有时为了打一个长途电话都会到他家去。碰到先生外出的时候,我会在那里边与师母聊天,边帮助做些琐事等待。王先生对自己学生关心的范围已经不光是学业,还有我们的人品、人格和与家庭相处的方式,当然,更关心着我们每个人的前途。我的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到王爷爷那里,得到他的疼爱。王先生病逝于2008年5月9日,我那年1月去病房向先生道别回美,先生握着我的手说了两句话,一句是“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?”另外一句话则是“向建华和孩子问好……”。这是我听到的先生最后说的两句话。每思及此,先生对生活的热爱,对友情的率真,对学生的期望,在在洋溢于眼前。

王元化一生的学术成果涉及文艺理论、古代文论、哲学、思想史、文化史及国家政治学说,博大而精深。现在对他的学术生涯和他对学术界的巨大贡献进行总结,时机似乎还不成熟——而且我本人也未必胜任。但我

觉得他的研究同学院派比较起来,却有一个显著特点,那就是为时代而作,为中国的命运而作。他自述的三次反思特别是第三次反思的成果,学界研究颇多,不少论文论述相当深刻,有的论著在王元化生前就得到他的认可,也使我从中得到教益。

个人觉得纵观王元化反思成果,最有贡献和最有价值的是他对卢梭《社会契约论》及其在中国影响的反思,也就是论者所谓的中国理论界所缺少的“国家学说的研究”。1992年王元化从一篇博士论文得到启发,敏锐地感觉到其中有关卢梭的公意和私意的论述(即卢梭认为“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,而众意只着眼于私人的利益”从而必须要用公意的名义来抽空众意的聚合空间,当然遑论私意了),以及在建立国家政权中,有关人民转让全部权力给权威,将从君主个人转化为“社会公意”,警醒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题目,其中内涵甚深。他认为此说导致“公意需要化身,需要权威,需要造就出一

个在政治道德上完满无缺的奇理斯玛式的人物。”而这种公意“是我们十分熟悉的”。他立即写信将看法与老友李锐分享，直率地分析受卢梭“公意说”影响后的中国政治思想界。但这个联想并没有到这里为止，王元化不断翻查五四人物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论述，并思考重新做国家学说的基础研究。张奚若及其论述进入他的视野：1930年代，时任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的张奚若在卢梭《社会契约论》中看出了跟国中流行观点不一样的看法，认为卢梭的民主是一种集体主义或国家主义，而五四时代对于民主问题仅仅停留在口号上，缺乏更深的探讨，所谓的启蒙没有真正的进行到完整、深刻的地步，五四启蒙者对于卢梭在民主之下所施行的专制理论理解不深，这种半截子的启蒙影响后来中国甚巨。此时王元化从反思五四进入了国家学说的探讨，时为1997年，王元化把对张奚若的介绍写进他《清园近思录》的后记中，发表后转给著名理论家吴江。吴江读后提出不同看